

解廷藩的42年云冈路

本报记者 赵永宏 赵小霞



解廷藩(中排右二)参加“亚洲地区文物保护讨论会”现场发言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朱迅在央视视频分享她在云冈石窟采访的感悟时说:“你知道‘款’字怎么写吗?我在云冈石窟‘修’石窟的时候,老师傅张俊才告诉我,在云冈石窟你要记住这样一个字‘款’,你要想快乐,‘款’——就快乐了,即思即到;你要想幸福,‘款’——就幸福了,即念即到。你到达目的地的最快方式,就是你已经在这儿了。这就是心随境转。想想自己了不起的样子,想想自己希望成为的样子。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悄悄努力,总有一天你会‘款’地到达。”朱迅的分享说出了每一个云冈人的心声,在这里工作,每时每刻都能体会到那种来自云冈石窟的幸福。无论是从岗位上退下来的老一代云冈人,还是新一代云冈人,他

们都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着这种对云冈石窟的爱。

解廷藩,这位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在云冈石窟工作了42年的老一代云冈人,所走过的每一步见证了云冈石窟从艰辛探索到科学发展的保护历程。42年云冈路,亲历了云冈石窟第一窟和第二窟试验工程、“三年工程”、九窟灌浆、“八五”维修工程等重大项目。尤其是九窟灌浆工程,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国家新闻电影制片厂还专门拍过一部电视纪录片,介绍过这一工艺。42年云冈路,还结识了余鸣谦、王书庄、姜佩文、黄克忠、李哲元、杨玉柱、杨烈等文物保护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他们身上,解廷藩感到了作为“文物保护人”的情怀修养和奉献精神。42年云

冈路,铭记着老一代云冈人共同参与多项云冈石窟保护工程的光辉岁月,那是一段砥砺奋进、拼搏向前、“款”出来的激情时光。

1959年春,19岁的解廷藩身着干干净净的工装,站在当时市文化局的办公室外,等待着即将开始的工作面试。此次是文物系统招考新人,在当时的解廷藩看来,“完全是陌生的,当时都不知道文物保护是要做什么。”通过面试后,解廷藩去侯马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培训,系统学习了文物知识,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培训之后,他被分配进入云冈石窟工作,从一名技术员到高级工程师,再到副所长,一路走来,见证了云冈石窟保护工作的发展壮大。

1960年7月,由原文化部古建筑研究所和北京地质学院联合组成“云冈石窟勘察队”,对云冈石窟进行大规模地质勘探、测绘工作,对地质岩石结构、水文、风化机理诸方面问题进行考察。同时,中科院化学研究所专门组建了专职化学研究室,派遣科研人员到北京工作。作为石窟科学保护研究的“试验田”,云冈石窟派解廷藩赴北京工作、学习。经过三年的工作学习,解廷藩初步掌握了对丙烯酸酯类材料的提纯、加工方法,可以独立完成配制工作。待实验室内丙烯酸酯类的应用研究成熟后,专职化学研究室主任决定应用到云冈石窟现场进行裂隙灌浆粘接加固的试验研究。当时遇到的难题是如何把化学材料运送到洞窟?在火车、汽车均不可行的情况下,专职化学研究室主任就派解廷藩和李哲元骑自行车负责化学材料的运送工作。1962年9月中旬,他们二人从北京出发,途经近400公里的砂石路,翻山越岭,经历了宣化到化稍营最难的俗称“五虎十八盘”的山路,历时一周时间,最终安全抵达大同。

1973年9月15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来云冈石窟参观访问时,面对中外记者大声宣布,“云冈石窟艺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存下来。刚才说有一个十年规划,时间太长了,要三年修好。”从此,云冈石窟保护开启了历史新篇章。“三年保护”是针对五华洞和昙曜五窟进行危岩加固,工程技术责任人是原文化部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原古代建筑研究所)石窟保护研究室主任余鸣谦先生。在余鸣谦先生指导下,云冈开展了三年的抢救加固工程。三年来,余鸣谦老先生一直活跃在工地。余鸣谦的教诲一直让解廷藩铭记在心,指导他一生的工作行动。“三年保护”工程的顺利实施,挽救了一大批濒临崩塌的洞窟及雕刻,基本解决了主要洞窟及雕像的稳定性问题,对我国石窟保护技术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1978年,云冈石窟岩体灌浆加固材料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团体嘉奖,解廷藩参加的原国家科委十年规划(1963—1972年)科研项目专48-019(重292)中“石窟崩塌、风化的防止与处理”课题同时也获得大会颁发的“围岩裂隙化学灌浆粘接加固”科研成果奖。解廷藩说,凡参与单位都获得了此奖项,云冈石窟第一次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团体嘉奖。

云冈石窟第三窟遗址是云冈石窟较大的洞窟,位于云冈东部窟群区域的最西端,前面断崖高25米,传为昙曜译经楼,中上部凿12个长方形石孔,窟前前室,前室上部中间凿出一个弥勒窟室,左右凿出一对三层方塔。后室南面西侧雕刻一佛二菩萨雕像。雕像工艺精湛,是隋唐时期的衣冠服饰和造像风格,当为北魏以后刻的作品,该遗址于1993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解廷藩

和黄克忠商议后提出的遗址保护办法,在当时看来具有积极作用。

到达云冈石窟的最快方式,就是你已经在这儿了。回首解廷藩老人42年的云冈路,他其实一直都在这里。用老人的话说,就是“国家花钱把我培养出来,我不能对不起国家。”42年来,解廷藩老人一直都在关注着云冈石窟的发展变化。在老人患癌的十几年时间里,心里一直怀着对云冈保护的坚定信念。2019年,复旦大学牵头编写《中国石窟保护七十年》口述史,第一时间找到了解廷藩老人。在接待采访组之时,他与黄克忠再次见面。两位老人重话当年石窟保护历程,往事历历在目,感慨万千。采访之后,年逾八旬的解廷藩

老人又想起了关心云冈石窟保护与发展的各级领导,并肩作战的前辈、老友,以及云冈石窟专业工程队伍。当今的云冈人继续将保护放在第一位,全方位不间断地开展保护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感到了所有云冈人的付出是值得的。今天,当新一代云冈人将最新的保护成果讲给他听时,他连连称赞,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代代云冈人用青春、坚持、奋斗换来的。

新时代,云冈石窟保护工作还在推进,新的课题和研究继续进行。踏着老一代云冈人的保护历程,更加激励和坚定了新一代云冈人做好云冈石窟保护工作的信心,云冈人将继续书写新时代的文物保护新篇章。



1989年美国圣蒂文物保护研究所、圣蒂基金会与敦煌石窟、云冈石窟开展合作保护工作,解廷藩应邀出访美国。图为和中国文物研究所副所长黄克忠(左)、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中)合影。



第18窟胡毗罗王子像

拓跋鲜卑,一个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他们逐水草而生,以畜牧、射猎为业,自是不具备雕凿佛像的技能。那么,宏大的云冈石窟营造工程该仰仗谁去完成呢?

成就一座石窟不只是凭借凿洞琢石的能工巧匠,还应依靠为佛像造像提供服务的其他大量劳动者。石窟选址,需要勘察山体地质结构的人才;开凿石窟,需要掌握营造工程力学的精英以及设计佛像本体的艺术家和规划、指导佛教造像题材内容的高僧。需要投入的,是一支造像集团的力量。怎样才能获取如此丰厚的资源呢?

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意识到自己将要面对的土地不再是单纯的草原,治下的臣民操着与自己不同的语言,穿着与自己不同的服饰,过去统治部落时期的经验已无法胜任治理一个人口众多、文化和经济都优于自己的社会。因此,在四方讨伐拓疆的征战中,鲜卑人非常注重对各地人才的网罗。

道武帝平定中山(今河北定州)后,将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役共计36万余人、百工伎巧十万余人迁充京师平城。所谓山东六州,指的是太行山脉以东地区,包括今河北、山东一带。一次性掠徙如此多的人口,且杂役、百工伎巧分别计数,说明当时对迁徙人口的工种已有较细致的分类。

太武帝骁勇善战,扫统万,平秦陇,剪辽海,荡河源。各地战俘以及归降北魏的人口被大规模迁入平城,京畿之地人口数量最高峰时达150万余,其中有匈奴、羯、氐、羌、高车、柔然、杂胡、吐谷浑、高丽等北方各少数民族,地域涉及辽东、西域、河西、关中、河南、河北、山东、淮南等,有文人、高僧、良工匠等,他们成为营建北魏宫城的最主要力量。

不同于稍早的敦煌莫高窟,也不同于随后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经北魏一朝凿就,从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用时仅约70年,营建主要洞窟45座,附属窟龕255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昙曜曾游历河西数载,在选择工匠时偏重河西工匠,所以,在由他主持的云冈石窟早期营造工程中,河西造像体系一枝独秀,居主导地位。石窟中的造像题材基本以符合习禅僧人谛观的形象表现,风格粗犷大气,概括洗练,这恐怕与昙曜“以禅业见称”不无关系。

云冈石窟中期伊始,孝文帝倡导汉化,义学发达的龙城(今辽宁朝阳)、长安(今陕西西安)成为平城佛教思想的新来源。昙曜的影响力开始减弱,凉州僧团式微,来自徐州、长安等地的造像集团成为云冈石窟造像团体的新主流。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都洛阳,平城沦为旧都,原先体现、代表国家

政治利益与精神信仰的云冈石窟营造工程,经由留居平城的中下层官吏及百姓续凿,功德主身份变了,洞窟的性质、功能等自然大异其趣。

总的来看,开凿云冈石窟的工匠来自以下几个系统。

1. 河北、山东工匠系统

拓跋鲜卑最早接触佛教,是在拓跋什翼健时期。咸和四年(329),什翼健被遣至后赵长达九年,实际上他是作为质子被扣留在后赵都城襄国(今河北邢台)的。后赵“备齐南夏佛法之事”,精通神异道术的佛教灵魂人物佛图澄就长期在这一带活动,后赵佛教蓬勃发展的景象,什翼健耳濡目染。

拓跋鲜卑真正有意识地接触佛教,始于道武帝时期。天兴元年(398)岁尾,道武帝徙六州22郡地方长官、豪门大户及百姓2000家,共计万余人至平城。泰常三年(418)四月,明元帝再迁徙冀州、定州和幽州的徙何人到平城。道武帝平定中山后,对佛图澄的弟子僧朗敬重备至。皇始中,年近60岁的赵郡沙门法果被召至平城出任道人统,统摄全国僧务。河北这块土地不但是佛教教,对佛教还有博大的包容心,太武帝废除佛教时,包括昙曜在内的各地僧侣都选择在此避难。

道武帝时广修佛寺,修整官舍,造五级浮屠、普曜山及须弥山殿,“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最早进入平城的河北工匠体系因云冈石窟工程尚未开始,主要参与的是平城佛教寺院项目的建设,但他们应是后来开凿云冈石窟的储备人才。

山东在纳入北魏版图之前,有60多年的时间都归属东晋及刘宋。太武帝灭佛时,山东因时属南朝,其佛教体系的完整性没有受到影响。皇兴元年(467),北魏攻克刘宋,三年后,山东大地纳入北魏的版图。青、齐之地高僧、工匠北上平城,为平城佛教艺术注入了新鲜的南朝风气。

2. 河西工匠系统

北魏佛教主要取法于北凉,凉州造像集团对云冈石窟的开凿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西晋永嘉之乱到东晋末世的百余年间,中原大地正处于纷争扰攘的乱世,各割据政权兵燹未止,鏖战不休。凉州地接西域,南奉晋室,远离王朝之争,得以独善其身。且凉州物产丰饶,社会安定,故中州的儒英、士族把它当作流徙避乱之地;西来的僧侣为躲避中原战乱也以此为终点驻锡传法。

谁雕凿了云冈?

赵昆雨 页小中

佛教由印度传入我国新疆后再逐渐向东,第一站便是河西地区。早在西晋时,竺法护的译经就已流布凉州(今甘肃武威)。

凉州,“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军事要地,北魏对凉州早已垂涎欲滴。北凉推行以佛治国,中天竺高僧昙无讖是指导这一模式的灵魂人物。太延五年(439)八月,太武帝亲率部众攻北凉。九月,北凉告亡。自此,中国历史上历时130余年的十六国分裂割据局面结束了。十月,太武帝徙凉州宗室、士民三万余家至平城。

这是一支超级“豪华”的移民队伍,其中聚集了众多声名卓著的河西士人及其家族,有敦煌刘氏、索氏、张氏、阚氏、宋氏,武威阴氏、段氏、王氏,金城赵氏、宗氏,还有陇西李氏、晋昌唐氏以及流寓河西的广平程氏、河内常氏、清河崔氏。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在平城得到了提拔和重用:金城人赵柔,“少以德行才学知名河右”,拜著作郎,编修国史;敦煌人索敞,“专心经籍”,“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姑臧人阴仲达,“少以文学知名”,委国史;陈留济阳人江式,善书篆、隶,拜中书博士……此外,在由凉州走向平城的征途上,还有几位耀眼的高僧——玄高、师贤以及昙曜。后来,玄高在平城“大流禅化”,深受太武帝信任,太子拓跋晃以他为师;师贤做了道人统;昙曜继任沙门统,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

凉州既平,北魏平城佛教迎来了兴盛期,并成为北方新的佛教文化中心。凉州工匠有丰富的开凿石窟经验,他们成为开凿云冈早期洞窟的最基本力量。

3. 长安、徐州工匠系统

十六国时期,前秦苻氏和后秦姚氏相继统治关中地区,二秦君主都推崇佛教,故长安成为佛法较早兴盛的地区。公元401年,姚兴邀请鸠摩罗什到长安译经,中国译经事业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期。始光三年(426),北魏大军攻取长安,克统万,徙万余户到平城。徙民中有一沙门名叫惠始,他曾在长安师从罗什,被太武帝带回平城后,广布佛法。惠始有跣足的习惯,据传,他即便光脚走在泥泽中,双脚也不被染污,世人送他“白脚大师”的雅号。

长安,本是佛教的圣地,后来,太武帝却在这里向全国发出灭佛的诏令。由崇佛到灭佛,我们无法知道这位帝王的内心当时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中国古代一共发生过四次灭佛事件,首次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至于灭

佛的原因,除了佛教与道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外,还有佛教自身的腐化堕落以及佛教与皇权之间的矛盾等,而发生在陕西杏城(今陕西黄陵)的盖吴起义是这场法难的导火索。太平真君六年(445)秋天,卢水胡盖吴率领羌汉等各族起义军在陕西杏城揭竿而起。次年春天,太武帝亲征盖吴,无意间在长安的一座寺院内发现藏匿的兵器与酿酒工具,更令他意外的是,佛门清修之地竟然设有供人行淫的密室。太武帝断定他们与盖吴有通谋,遂下令诛沙门、焚佛像,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法难——太武帝灭佛发生了!曾经佛光普照的长安城,一夜之间,寺庙佛塔莫不倾毁,一境之内,沙门绝迹。平定盖吴起义后,太武帝徙长安能工巧匠2000户至京师,其中有一个被施阉刑的小孩,他就是后来主持开凿云冈石窟崇福寺的羌人王遇,方山灵泉造像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庙也由他主持监建。

徐州,古称彭城,地处黄淮平原,得南北政权之界的地理优势,高僧云集,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刘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举城归附,彭城纳入北魏版图。太和四年(480),徐州、兖州两地数万民众及僧人起义,次年二月,孝文帝以平叛暴动的名义,俘三万余人北徙平城。受长安、徐州佛教文化影响,平城佛教这一时期盛行讲论《法华经》,云冈造像出现大量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平基、瓦顶、斗拱等构件,附设榜题画面、雕饰



云冈第18窟弟子像

龙雀夔尾等汉风事象充盈窟室,呈现出一派雕饰华丽的汉化气象。

除了以上各地僧团、工匠参与云冈石窟的营造,还有部分外国僧团带着佛像粉本进入了云冈石窟。据《魏书》记载: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造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造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记: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沙勒即疏勒。想这两件事被写入《魏书·释老志》,可以见得当时的佛像粉本一定对云冈石窟造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第12窟窟门顶部汉式龙